



《哲学与文化》丛书 | 江怡 主编

唯一的历史科学

——马克思学说的自我规定

沈湘平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哲学与文化》丛书 ■ 江怡 主编

唯一的历史科学

——马克思学说的自我规定

沈湘平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唯一的历史科学：马克思学说的自我规定 / 沈湘平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4
ISBN 978-7-5161-8366-3

I. ①唯… II. ①沈… III. ①历史哲学—研究 IV. ①K0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36589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冯春风
责任校对 张爱华
责任印制 张雪娇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0.25
插 页 2
字 数 330 千字
定 价 7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自然史，即所谓自然科学，我们在这里不谈；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的是人类史，因为几乎整个意识形态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撇开人类史。意识形态本身只不过是这一历史的一个方面。

——卡尔·马克思

总序：从文化自觉到哲学自觉

江 怡

中华民族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中华文化的复兴被看做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在这个重要历史时刻，我们能否抓住机遇，在历史文化的厚重积淀中寻找自己的定位，在传承文化的历史使命中创新自己的观念，在时代文化的多样变化中构建自己的特色，这些都是我们面临的重大历史挑战。把握好这个历史机遇，回应重要的时代挑战，不仅需要我们充分的知识准备，更需要我们的思想智慧。

当今中国的文化发展已经向我们表明，文化自觉的树立正在极大推进着我们的社会发展，文化自觉的结果将改变当今中国的文化形象。我们知道，这里的文化自觉首先是指对自身文化的强烈认同，是自身文化意识的提升，也是社会大众对文化发展的迫切要求。思想上的认同并不等同于行动上的一致。只有当我们充分认识到文化认同的重要性，并努力从行动上体现我们的文化认同，我们才能达到真正的文化自觉。文化自觉更是指思想上的自觉，是我们在思想上真正形成对自身文化性质的理解，特别是对当今世界文化发展转型过程中的不同文化形态的认识，最后构建我们自身文化的特殊性和普遍性。这里的特殊性是指，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已经体现为当今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因此，如何在当今世界文化格局中体现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文化的时代效应。这里的普遍性是指，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必须得到世界各国不同文化的理解，因此，这样的特殊性就必须以具有普遍意义的表达形式加以体现。只有在能够为世界各国文化理解和交流的基础上，我们的文化才能真正进入“自在自为”的阶段。然而，要做到文化的这种自觉，我们必须抓住文化的核心和精髓，这就是时代的哲学思想。确立文化自觉的关键，应当是做到整个民族在哲学上的自觉。

中华民族富有哲学思维的传统，中华文化蕴涵深邃的哲学思想。无论是《论语》、《道德经》，还是《中庸》、《大学》，这些代表着中华民族智慧的论著都充分展现了中华文化的哲学思维特征，这种特征表现为思想行动以个人认识为前提，观念形成以经验活动为前提。虽然中国哲学学科的自觉意识产生于西方哲学传入之后，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始终是哲学式的。中国人的智慧具有这样两个特点：第一，中国人善于从身边的具体事项中发现具有普遍意义的道理，并总是试图用这些道理去理解其他相关或相近的事项，由此完成对事项的理解。在这种意义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更关注的是事情的过程，而不是在这个过程中呈现出的事物本身。第二，中国人对事物的理解更多的是从关系出发，更多地关注自己周遭生活环境的人和事，更多地考虑如何从各种关系中确立自己的位置。在这种意义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就更重视整体和全局，而不是个体和局部。由此可见，中国人的思维特征和智慧特点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对应：个人认识活动是以在身边所发生的事情为根据和出发点的，因此，中国人的思维具有经验归纳的特征；而经验活动本身又是为了更好地认识整体和全局，所以，中国人的思维又具有抽象普遍的意义。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中国人的这种思维方式并非出自我们的自觉意识，而是对前人长期生活实践的经验总结，是对中国传统思想表达的提炼升华。虽然我们一再强调中国人思维方式的特殊性和普遍性，但是这种强调却是建立在我们理解了不同于我们思维方式的西方哲学的基础之上，是我们通过不同哲学之间比较的结果。哲学思维方式的差异给我们带来了对我们自身哲学的重新认识，甚至是对自身哲学思维方式的重新定位，激发了我们全面理解自身哲学的浓厚兴趣。正是在这种思想背景中，我们开始形成对自身思维方式的自觉。

首先，哲学的自觉意味着我们对思想的主动认识。黑格尔说：“人之所以比禽兽高尚的地方，在于他有思想。由此看来，人的一切文化之所以是人的文化，乃是由于思想在里面活动并曾经活动。……唯有当思想不去追寻别的东西而只是以它自己——也就是最高尚的东西——为思考的对象时，即当它寻求并发现它自身时，那才是它的最优秀的活动。”^① 思想正

①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0页。

是在成为自己的对象的时候，哲学由此产生。因此，哲学的自觉本身就意味着思想。这里的思想并非完全是对具体事物的认识活动，或者是对事物发展演变的规律性理解，而是以概念的方式对我们认识活动内容的抽象概括，是对事物发展规律的概念化表达。这种思维方式就要求思想以概念的方式形成对我们所认识的思想内容的表达和构造，也是对我们思想本身的概念规定。纵观我们目前的哲学思维，我们似乎缺少的正是这种对思想的主动认识。我们比较容易满足于对事物表象的理解，比较容易接受从经验中得到的知性认识，而不太愿意从概念的层面把握事物的根本性质。真正的思想应当在于能够在事物之上确立把握事物的基本原则，能够在经验之先具备理解经验的基本能力。正如黑格尔所说：“真正的思想和科学的洞见，只有通过概念所作的劳动才能获得。只有概念才能产生知识的普遍性，而所产生出来的这种知识的普遍性，一方面，既不带有普通常识所有的那种常见的不确定性和贫乏性，而是形成了的和完满的知识，另一方面，又不是因天才的懒惰和自负而趋于败坏的理性天赋所具有的那种不常见的普遍性，而是已经发展到本来形式的真理，这种真理能够成为一切自觉的理性的财产。”^①

其次，哲学的自觉在于我们能够形成对事物的整体理解，能够从较高层面把握事物发展的基本态势。马克思说：“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② 这种彻底不仅表现在理论本身能够自圆其说，更重要的是理论能够把握整体，能够从宏观上对事物有完整的理解。而且，这样的理论还要在实践中得到检验，由此表明理论在实践中的彻底性。显然，这种哲学的自觉就要求我们必须认清历史的发展脉络，使理论具有前瞻性和预见性，而这种前瞻和预见正是彻底的理论自身具备的本质特征。经验主义的方法只会使我们裹足不前，完全从经验出发就会使我们“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有当我们真正形成了对事物的整体理解，只有当我们可以从宏观上把握事物的发展规律，我们才能从哲学的高度解释我们在经验中面对的

^①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48页。

^②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各种现象，才能在事物的各种变化中把握事物的发展脉络。

再次，哲学的自觉还表现在对理论思维的自觉培养，表现为对以往哲学史的学习和理解。恩格斯说：“理论思维无非是才能方面的一种生来就有的素质。这种才能需要发展和培养，而为了进行这种培养，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办法。”^①他指出，每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那个时代的历史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内容和不同的形式。因此，只有通过对不同时代的理论思维的学习理解，我们才能提升自己的理论思维能力。这里的理论思维能力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科学思维能力，一个是哲学思维能力。科学思维能力帮助我们对以往历史中出现的各种科学假说和科学思想形成恰当的判断，有助于我们认清我们这个时代的科学理论和思想的创新程度。但科学思维能力仅仅停留在或者说只能在对经验现象的表层理解，即使是对经验现象的科学解释也不过是采用了逻辑的方法，对这些现象重新分类而已。而哲学思维能力则对我们的思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要求我们必须能够超越经验现象，通过对各种现象表面的理解达到对现象背后本质的把握。这就需要我们首先了解以往哲学史上所出现的各种理论观念，在历史的脉络中寻找我们这个时代出现的各种所谓新观念的历史踪迹。同时，这还需要我们具备超越历史和经验本身的抽象能力，能够从历史和经验中剥茧抽丝，形成我们自己的理论观念，用于解释我们当代的现实问题，并提出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

最后，哲学的自觉更表现为对辩证法的自觉运用，表现为对“绝对真理”的放弃和对现实实践活动的最终关注。按照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思想的运动不过是绝对精神在人类思维中的变化过程。虽然这样的辩证法是以概念和现实存在的颠倒关系为前提的，但其中有一个重要思想是我们必须牢记的，这就是说，只有当我们能够按照思维自身运动的方式理解事物的发展，也就是当我们能够自觉地运用思维的辩证法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理解思维活动如何与现实存在之间产生矛盾和冲突，也才能真正理解为什么我们必须把思维活动的最后结果放到现实的实践活动中加以检验。这就意味着，辩证法不仅运用于思维活动本身，更是运用于我们在现实的

^①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页。

实践活动。用辩证的方式观察事物，解释现象，提出观念，形成理论，这些就是哲学的自觉表现。

从文化的自觉到哲学的自觉，这体现了我们对自身文化的更深层理解，是我们对自身文化的负责态度。仅仅停留在文化自觉的层面，我们还只能从自身文化的特殊性上把握思想的力量，只能依靠我们对自身文化的理解体会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别。而哲学的自觉则帮助我们概念的层次上理解思想的构成和变化，从思想自身的发展中把握观念的历史作用。从更广泛的当今世界文化的视野看，能够做到哲学自觉，才会使我们的文化自觉变成具有普遍意义的行动，才会使我们自身的文化特征得到广泛的认同和理解。

本套丛书冠名《哲学与文化》，正是基于以上的考虑，因为文化是哲学的外在体现，而哲学则是文化的内在精神。我们将在本丛书中陆续出版国内具有影响的哲学学者以及其他学科学者的最新著作，充分反映国内学者们在哲学与文化领域中的独特思考。

本丛书得到国家“985工程”人文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价值观与民族精神”的大力资助，特此感谢！

目 录

总序	(1)
导言：以“回到”的方式“经过”	(1)
第一章 历史科学的出场	(13)
一 “历史科学”的合法性辩护	(13)
(一) 对几种称谓的检讨	(14)
(二) 马克思自己的规定	(26)
二 为什么是“历史科学”？	(39)
(一) 德国注重历史的传统影响	(40)
(二) 彻底批判宗教神学、形而上学、意识哲学的旨归	(48)
(三) 对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的双重超越	(56)
(四) 际遇“科学”“实证”的时代精神	(60)
(五) 对整体性统一科学的追求	(66)
第二章 “历史”与“科学”	(74)
一 历史科学的“历史”	(75)
二 历史的本体：实践	(84)
三 历史的主体：人	(95)
四 历史科学之“科学”	(100)
第三章 大写的历史科学	(110)
一 历史科学的本质规定：历史性和历史主义	(111)
(一) 存在的历史性	(112)
(二) 历史主义	(117)
二 实践的诠释学原则	(124)
(一) 作为实践科学的历史科学	(125)
(二) 作为解释世界的历史科学	(128)

三 完成了的人道主义	(134)
(一) 人的存在及其内在矛盾	(135)
(二) 人道主义之辩	(138)
四 总体性及其方法	(144)
五 对方法论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的超越	(151)
第四章 “一门唯一的科学”	(166)
一 历史科学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	(167)
(一) 历史科学与哲学	(168)
(二) 历史科学与政治经济学	(174)
(三) 历史科学与科学社会主义	(178)
二 历史科学与历史学、历史哲学	(181)
(一) 历史科学与历史学	(181)
(二) 历史科学与历史哲学	(184)
三 历史科学与实证科学	(189)
四 历史科学与文化科学或精神科学	(195)
第五章 历史科学的公共性意蕴	(203)
一 共同活动方式及其现实矛盾	(204)
二 个体利益、普遍利益与公共性批判	(212)
(一) 个体利益与普遍利益矛盾的解答史	(212)
(二) 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危机	(220)
(三) 历史科学视野中的公共领域	(223)
三 历史科学公共性的当代诉求	(228)
第六章 历史科学的悲剧意识	(239)
一 作为本质力量的激情	(239)
二 历史的戏剧隐喻	(246)
三 历史进程的悲剧性	(254)
四 共产主义运动的悲剧进程	(261)
附录 1: 作为历史科学的经济学	(275)
附录 2: “理性”的历史化与历史的理性化	(288)
主要参考文献	(299)
后 记	(309)

导言：以“回到”的方式“经过”

1840 年以降，救亡图存和追求现代化成为中华民族互为表里的两大主题。无论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还是效法西洋制度的百日维新、辛亥革命都不曾从根本上改变中华民族落后挨打的局面。以“五四”运动为高潮的新文化运动才使得中国真正从思想、文化这一原则高度上进行反思、借鉴与探索。正是在各种思想百花齐放、各种主义百家争鸣之际，马克思主义登上了中国历史舞台。历史的筛选机制是公正的，它不是在问题与主义间做简单的选择或平衡，而是把是否有效解决中国问题作为各种主义的试金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它在中华大地上缔造的奇迹见证了意识与存在、理论与实际、理论与实践之间奇妙的辩证法！人们心悦诚服地相信，而且也应当相信，1949 年新中国的成立与马克思这位洋人有着莫大的关系。

新中国成立标志着中华民族救亡图存问题基本解决，现代化则突显为最强音。无论是前期充满曲折的艰辛探索，还是后来凯歌行进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的规定性始终牢牢地锚定在社会主义道路，思想旗帜始终鲜明地标识为马克思主义。当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无论是救亡图存，还是现代化，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着一个基本的方法：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结果是马克思主义改变了中国，中国也改变了马克思主义。在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走出了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被西方称为“北京共识（中国模式）”。中国和平崛起、走向复兴的反响与意义在“从华盛顿共识走向北京共识”的呼声和此起彼伏的“中国威胁论”的聒噪中得到了辩证的确认。斯大林曾经对“不听话”的毛泽东说过这样的话：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这句话在强力逻辑的背后渗透着浓浓的无奈。不过，在我们看来，即使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但至少成

熟的、真正的胜利者是应该自我反思的，因为这是其自我确认与不断进步的内在动力。放眼世界与历史，中国的现代化或者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还未到奢谈胜利的那天，因此其作为重要动力机制的自我反思显得尤为重要。

马克思主义之传入中国，从一开始就际遇着来自各方的质疑，其内部也一直存在着左与右的争论。“文革”结束后，从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到人道主义与异化、人的价值等问题的炙热研究，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反思性理解与思想解放的历史同步前行。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90 年代初，国外苏联、东欧发生剧变，国内伴随着改革开放产生诸多问题，与尼克松“不战而胜”的预言和福山“历史的终结”的断语相呼应，马克思主义遭受过空前的危机与攻击。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国内外一批学者更加系统地反思现实的马克思主义^①，这一趋势至今犹盛。显然，反思的前提是现实的疑问：我们熟知的马克思主义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吗？马克思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是什么样的关系？马克思主义过时了吗？中国应当如何在世界大势中自决？世界将拥有一个什么样的未来？这其中最为核心的问题又有两个：一是世界和处于其中的中国应该往何处去；二是马克思的幽灵对于这样的决策是否依然管用。作为历史建构下的现实，这样的问题都是实实在在的，决非理论上的无病呻吟。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也是致力于现实地改变世界的。但是，现代学术的体制必然将之首先归置为一种研究的策略与主题。按照黑格尔的定义，所谓反思就是“以思想的本身为内容，力求思想自觉为思想”^②。因此，对现实的马克思主义的反思在很大程度上预设了这样一种诉求：使马克思主义自觉为马克思主义。

在中国，与现实的、政治的马克思主义攻城略地式的与时俱进不同，学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自觉）的重心似乎集体无意识地“倒退”回原点或原典。综观近三十多年来国内外的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研究，“回到马克思”确乎成为强劲而成绩斐然的潮流。今天我们缘何要“回到马克思”？质而言之，这不过是一种基于实践的理论反思的彻底性表现。无论

① 严格地说来，当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建立起，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反思就在西方形成一种思潮，是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滥觞。

② [德] 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版，第 39 页。

如何，当我们确认要“回到马克思”时，也就确认了两个前提：

一是目前我们对马克思的很多理解是不太准确或者说是有问题，否则没有必要回到马克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当下中国一项国家战略高度的理论任务，这一任务本身就表明：马克思主义对中国而言是先验的、确定的，问题只在于如何使之中国化，而且目前马克思主义还不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尚在途中。但是，问题恰恰在于，我们长期以来理解的，对中国而言是先验的、确定的马克思主义，是历史地形成的，本身是需要历史地说明的。如前所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在谱系上是根源于苏联的。苏联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至少由于如下两件事情而被强烈地针对化和简单化了，这两件事情就是革命形势的紧迫需要和马克思重要著作（例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等）未能及时出版。正是这以苏联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遭受了西方一些优秀思想家——包括波普尔、哈耶克、伯林等——的批评甚至攻击，同时也促使了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当马克思的重要著作现于天下，我们能心平气和地对之进行学术研究的时候，我们应该承认马克思的学说和马克思主义的确有着重要差别——马克思甚至曾经宣称他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很难说马克思主义在一切方面都误解了马克思，也不是说马克思学说的一切方面都比马克思主义更为深刻、正确。但毋庸置疑的是，传统上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确实将马克思的学说简单化了。就连许多反对马克思学说的也是这样认为的。例如，早在1949年马克思主义如日中天的时候，以赛亚·伯林就对内在的、冷酷的、无所不在的“历史规律的魔镜”进行无情的抨击。但他明确地说出了如下的话：“当然，我不想把这归咎于黑格尔或马克思，他们的学说更复杂也更有道理。我只想将其归咎于他们的追随者那些‘可怕的简化者’。”^① 经历苏联东欧剧变后的1999年和2005年，马克思依然被英国BBC电台分别评选为“千年伟人”和“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则可以看作是这一看法的民间确认——那就是人们可能不一定赞成现实的马克思主义，但依然敬仰马克思本人及其思想。事实上，我们只有回到马克思才能正本清源，让马克思主义更切近马克思的“主义”。

二是回到马克思对于解答我们今天的理论、现实问题有着极大的帮

^① [英] 以赛亚·伯林：《自由论》，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63页。

助，否则回到马克思是没有意义的。马克思之后的历史确实已经沧海桑田，毋庸讳言，马克思学说中的一些论断、结论在今天看来也已经不合时宜了。我们“回到马克思”决不是要像宗教的原教旨主义那样将马克思神化，而是因为马克思所开启的理论视阈依然具有最强的解释力，我们依然处于马克思所揭示的问题阈与所划定的时代之中。正如马克思那句被反复引用的名言所述：“问题却是公开的、无所顾忌的、支配一切个人的时代之声。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① 一个时代是否已经发生根本性跃迁的关键，不在于政治家的宣言、诗人的咏叹抑或思想家们的主观判断，而在于这个时代的问题是否真正得到解决。马克思揭示和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及其后果，只要资本主义还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存在于世，马克思的批判就依然有效，而事实上，我们今天所处时代的资本主义性质是如此清晰、广泛、深入、坚固，这是前所未有的。正如吕贝尔评价马克思《资本论》时说的：“直到该著作所分析的经济系统完全崩溃，这一批判才将终结。”^② 的确，无数的事实证明，马克思的方法论依然是我们不得不运用方法时的最佳方法。无论是全球化、现代性的宏观大局，还是个人权利、个性发展等个人叙事，不管从哪门哪派思想入口，只要达到深刻，我们就能体味到萨特那句名言的灼见：马克思主义是当今时代唯一不可超越的哲学。埃尔斯特毫不犹豫地断言：“我发现，大多数我认为正确的和重要的观点都可以追溯到马克思。这包括方法论、各种基本理论以及（最重要的）各种价值。”^③ 詹姆逊明确指出那些指认马克思已经过时的说法是“不合逻辑的”，而德里达则清晰地表述了如何才是合逻辑的：“不去阅读且反复阅读和讨论马克思——可以说也包括其他一些人——而且是超越学者式的‘阅读’和‘讨论’，将永远都是一个错误，而且越来越成为一个错误，一个理论的、哲学的和政治的责任方面的错误。……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无论如何得有某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3页。

② [法] 吕贝尔：《吕贝尔马克思学文集》（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10页。

③ [美] 乔恩·埃尔斯特：《理解马克思》，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03页。

个马克思，得有他的才华，至少得有他的某种精神。”^① 霍布斯鲍姆在评述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改变世界的传奇的基础上，剖析了人类在 21 世纪面临的诸多问题以及马克思之外的种种解决方案，尤其是经济自由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认为它们“无论是单独还是结合起来，都不可能为 21 世纪的种种问题提供解决的方案。”他平静但不容置疑地告诫这个世界：“现在又是应该认真地对待马克思的时候了。”^② 事实上，我们只有回到马克思才能更好地运用“马克思”，更好地改变中国和世界。

认识如斯，接下来的有效问题就是：如何回到马克思？回到马克思的什么？“回到马克思”在本质上意味着什么？

有一种观点认为，我们对马克思的误解起于对马克思文本的遮蔽与误读。所谓遮蔽是指由于历史原因或政治原因，我们只读到了马克思的部分著作或完整著作的部分，而遗漏了马克思的其他著作或著作的其他部分，甚至这些没有读到的著作或部分恰恰是最为重要的。所谓误读既包括“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式价值涉入的歪曲，也包括由于版本、译本的精确程度导致的误解。于是，“回到马克思”就要重读马克思，以价值中立的方式科学地研究马克思的文本，精确地掌握其本来含义。这就是文献学、文本学的“回到”方式。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法国学者吕贝尔就有感于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思想的种种曲解，而挑起了“马克思学”（Marxologie/Marxology）的大旗。近年来，这一近乎经院式的考据思潮在俄罗斯、日本、欧洲颇有影响，在其泽被之下，中国的马克思学也应运而生（中国的马克思学式的研究路径则早于中国马克思学的诞生），甚至我们可以说，近年中国在马克思学说方面研究取得的诸多成就主要是依靠这一路径取得的。

问题不在于是否要重读马克思和从马克思的文本入手，而在于我们是否应该和可能以价值中立的方式去面对马克思的文本。按照解释学的理论，重读马克思与重新理解马克思是等价的。理解不同于镜喻式的认识和白板式的反映，而必然包含着理解者的成见与视阈——没有一种阅读是无辜的。于是，在国内学术界出现了所谓以恩（恩格斯）解马、

① [法] 雅克·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1 页。

② [英]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如何改变世界——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传奇》，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385 页。

以苏（联）解马、以西（方哲学）解马、以西（方）马（克思主义）解马、以现实解马，甚至以中（中国哲学）解马的不同路径。即使是就“科学”的马克思学而言，又存在着西方马克思学、苏联马克思学、日本马克思学和中国马克思学之分。暗淡了历史冲突的刀光剑影，与现实政治意识形态保持一定距离，在“回到”的平台上，尽管不断有人宣告自己的解读唯一正确，也确实存在凭借权力与知识的微妙关系构筑的学术霸权，但总的来说“重读马克思”确乎已经进入一个“平权”时代。同样，按照解释学的理论，马克思的文本敞开的是一个不可穷尽的可能世界，回到马克思将是一个永远没有尽头的过程。尽管我们不会愚蠢到去倡导一种“怎么都行”的相对主义，但至少每一位重读马克思的人都必须高度重视这一不可避免的解释学情境。

在意欲“回到马克思”之时，明了上述情境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首先，回到马克思是一个真理与价值相统一的历史性活动。我们之所以要回到马克思，是因为当前遇到了理论、现实的困境，“回到”的动机本身就包含着真理性诉求；我们希望穿过层层意识形态、学术传统的包裹，以近乎现象学的方法达到本真的马克思，这又是另一层含义上的真理性活动。但是，“回到马克思”也是一项人文性的活动，它不仅不自觉地预设了对当前理论、现实问题“管用”的价值目标，而且是以诠释、理解马克思的路径来“回到”的，因而它不可能是价值中立或价值无涉的。当然，那些作为理解前结构的价值立场不应该是等量齐观的。我们认为那些尽可能在准确、全面地把握当前的理论、现实困境基础上形成的价值立场是最可能科学的。然而，对当前理论、现实困境的把握本身乃是一项真理性的活动，而能否在当前理论、现实困境的把握上达到真理，又与把握者的立场、世界观、方法论紧密相关。可见，回到马克思不是一个简单的真理性活动，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价值性活动，而是真理与价值相统一的活动。不仅如此，这一真理与价值相统一的活动确乎在任何一个层次上都有着无限的复杂性和生成性——决不是学界曾经讨论的学术性与现实性关系问题那么简单。我们正是在这种复杂的、生成的历史性活动中编织着意义之网，改变着现实世界。

其次，必须回到整体的马克思。既然回到马克思是一项理解性的人文活动，就有可能导致一种歧异性阅读，甚至在德里达等不少人看